

于
川
著

上海闲人

一部集传统文化与现代气息于一体的都市轻喜剧
一个逃避商海重压，回归自然生活的闲人的心路历程
一群有钱又有闲的人喜怒哀乐的故事

花城出版社



上海

于 川 著

闲人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上海闲人

于川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2. 4

ISBN 7-5360-3780-5

I. 上 …

II. 于 …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1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8739 号

责任编辑: 詹秀敏 李 谓

封面设计: 苏家杰

技术编辑: 易 平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

印 刷 江门新华印刷厂

(江门市华园中路)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10.75 1 插页

字 数 250,000 字

版 次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8,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3780-5/I·3088

定 价 1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一群有钱又有闲的人喜怒哀乐的故事

一个逃避商海重压，回归自然生活的闲人的心路历程

一部集传统文化与现代气息于一体的都市轻喜剧



上海闲人



序

我手写我心

写作一直是我的一个永远难以醒来的梦，从我十二岁那年“胆大包天”地写下了被自己称作“小说”的第一篇作品开始，到我的第一部正式出版的长篇小说《中关村倒爷》的付梓，这个梦一做就是整整二十六年。

童年时的我是一个很内向的孩子，从初谙人事时起，我就被大院中其他的孩子叫做“狗崽子”、“小特务”，因为我那革了一辈子命的父亲忽然在一夜之间被“文化大革命”革了他自己的命。政治斗争残酷的阴影笼罩着我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那时候孤立无助的母亲赖以保护她的儿女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我和姐姐们锁在家里，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少受一点伤害和侮辱。在那灰暗、阴鸷的日子里，我聊以消遣的就是读家里丰富的藏书，这恐怕还要感谢“红卫兵”小将们的手下留情，几次抄家时除去一些“封资修”的东西，父亲的藏书大多得以保留了下来，它们成了我儿时最大的快乐。

母亲终于也在父亲死后的第七个年头永远地离开了她的儿女们，我不知道她是否在另一个世界里和父亲重温他们生前的美好，但我却在从一九七五年迟来的春天里完全全地成了孤儿。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我所能领略的却只有欺侮和蔑视，我习惯了忍受，忍受侮辱，忍受唾弃，甚至忍受我最憎恨的怜悯。那时，只有暗夜才是属于我的世界，在北京冬夜的风中，我会在姐姐睡熟后偷偷地溜出家门，悄悄地摸到机关大院里那座白色的图书大楼，这里书库的一扇窗户总是虚掩着的，那是被我撬开的，夜色下，我轻盈地爬进书库，借了电筒的微弱的光，在那些被封存的“禁书”中寻找自己的中意的书籍，然后把它们装

进军用挎包，带回家去细细地读。其实，现在想来实在有些可笑，当年那些“禁书”不过是《青春之歌》、《红旗谱》、《少年维特之烦恼》、《安娜·卡列尼娜》一类，但在当时我这样做却几乎够得上天大的罪过了。书读得多了的结果只有两个，一个是对那些伟大的作家们产生了一种由衷的钦佩，而另一个就是自己忍不住跃跃欲试，要写点什么，当时还不知道这就是“创作的欲望”。

十二岁时，我终于写出了一个大约六七千字的短篇小说，情节和内容现在想来是极其幼稚的，而且还带着那个时代浓重的政治色彩，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奉命文学”了，原来每个人都无法抹去所处时代的烙印。我的“处女作”诞生的时候，正是“黄帅事件”之后，全国都在大批“师道尊严”，于是我的作品也写了一个小学生和保守的老师斗争的故事，完成之后还傻傻地拿给我的班主任老师去看，这个教过我们姊弟三人，而且一向对我很关照的老师气得脸色青白，把我狠狠地骂了一顿。老师的责骂却并没有让我从梦中醒来，我依旧执着地写，只是不再给任何人看了。

“文化大革命”在革去了许多诸如我父母一样的无辜者的生命之后，终于结束了，我可以堂而皇之地读自己喜欢的书，做自己越来越浓重的文学之梦了。在学业上我是幸运的，虽然因为进了体工队耽误了两年学业，但当我重新回到学校后，我还是顺利地考上了北大中文系的中国文学专业，我觉得自己的梦终于向现实又迈进了一步。学文学这是源于少年时的梦想，而上北大，是仰慕那里涌现过的无数先贤大哲和她赋予学子的那份做人的刚直。初入大



学，自己骄傲于北大学子的荣耀和文学专业的风光，一下子觉得仿佛已经是一个风华正茂的文学青年了，于是毫不吝惜笔墨地大写特写，作品几乎涉及了所有文学形式，然后就是满怀豪情地到处投稿，幻想着一夜之间圆满自己的“作家梦”。从在《星星》上发表第一篇诗作到大学毕业，虽然也拿到过几次稿费，却始终没有被人们认可，我不得不静下心来，反思自己的作为，终于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是太执拗于成为作家的功利思想之中了，写出的东西要么是“跟风之作”，要么是“模仿之作”，就是没有完全属于自己内心和风格的东西。我发现虽然相对于同龄人，我的经历算是比较丰富的，但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却是远远不够的，而且由于对深层次的东西的反思和积淀的不足，即使是写自身的经历也多是停留在表层的具象上，这是一个无法在短时间内治愈的硬伤。于是，我在大学三年级以后就不再写作了，而是把大量的时间用在社会活动和读书上，希望以此丰富和充实自己。

大学毕业后，我进了国营企业，而后下海，东闯西杀地奋斗了将近十年。一九九八年的初春，北京的风还冷着，我那位位于北京郊区门头沟，占地面积超过两千亩的农场的地上刚刚露出绿色，我带着心爱的九条纯种的“德国黑背”漫步在农场边上的永定河畔，对着潺潺的河水，忽然发现自己已经耗费了整整十年的时光。十年里，我从一个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名下拥有两家公司、一座农场的商人，应该算是在商场上成功了，但那个萦绕在心头永远无法磨灭的文学之梦呢？它却从来没有因为商场上的成功而变得淡漠起来，它无时无刻不搅扰，甚至是折磨着我，

生活积淀的加深，思想的成熟，更加剧了我对文学执着的追求，就像我的这些猎犬一样，只要没有把猎物按在爪下，就永远不会放弃对它们的追逐。回想十年中亲身经历的种种变迁，创作的欲望终于在沉寂了多年之后蓬勃地爆发了。当我对我的助手说，要把我名下的产业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出让给他的时候，他真的以为我是疯了。

我抛弃了十年间建立起来的商场上的事业和成就，和太太带着儿子一起回到她的家乡——上海，开始了我的隐居和创作生活。

做了“寓公”，一切都变得简单轻松起来。生活中不再有商海的芜杂，世事的喧嚣，一处算不上大的房子，一辆称不上好的车子，一个贤淑的妻子，一个聪明的儿子，构成了我的安乐窝。泡上一壶好茶，燃起一炷安歇香，我便开始对永远专注地听我诉说的电脑讲述过去的故事。心中网着一份安然的冲淡平和，埋头书斋后“厚积薄发”，先后创作出长篇小说《危楼》、《中关村倒爷》、《海南过客》、《上海闲人》。这四部长篇是我十年商海奋斗历程的写照，也是经过十年思考和探索后逐渐成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概括。

《危楼》的创作实际上始于我在商海中最后的两年间，不过到跳出商海后对于生活和情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原有的情节上又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改和再创作。而真正是基于对十年商海浮沉的总结和反思的作品，却是自《中关村倒爷》开始的。我在《中关村倒爷》的《后记》中谈到这部长篇的创作动机时曾经这样写过：

“我曾经是‘中国硅谷’中的小人物中的一员，所

以，我更关注他们的生活和情感，他们是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上最弱势的群体，他们在商场上所历的艰辛，要远远超过那些灿烂辉煌的商业巨子们，虽然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最终如《中关村倒爷》中‘他’那样，成功了，辉煌了，但刻在他们心头的残酷的伤痕却是他们此生此世挥之难去的永远的痛。为了这所谓的成功，他们付出和牺牲的太多太多，他们用自己的青春，情感，灵魂，肉体，甚至生命，打造他们成功的丰碑。对于成功者，这样的付出已经是他们的幸运了，毕竟他们在事业上终究有所收获；而对于失败者，他们只有带了满身的伤痛和一颗流血的心，默默地继续他们人生的旅程，没有鲜花和赞美的补偿，有的只是锥心的痛。

“‘中国硅谷’缔造了许多令人景仰的商业、实业巨子，也淹没了无数失败的小人物。今天，人们在关注中关村，关注‘中国硅谷’的时候，却大多忽视了那群同样奋斗过或者正在奋斗着的小人物的存在，而正是他们的血汗和才智，使得这‘中国硅谷’繁荣如此，锦绣如斯。

“离开中关村已经几年了，但中关村的小人物们无时无刻不在我的心中顽强的活着，我曾是他们中的一员，我最能感受他们的心灵和他们的生活，他们是一群真正的强者，虽然他们可能失败，但他们奋斗过，努力过，他们就无愧于人生，无愧于理想，他们是小人物，但他们绝不是‘苟活者’。我写《中关村倒爷》是为了纪念我的一段生活，更是为让更多人了解那群生活在恢宏的‘中国硅谷’光环的暗影下的不起眼的小人物。”

商海是残酷的，这种残酷扼杀了许多人的理想、精

神，乃至生命，但商海又是慷慨的，它给予人们财富、智慧甚至情感。商海是现实社会，特别是今天这样的经济社会的缩影，这里幻化出的人和事，你会在不经意间发现他（它）们就在你的生活里活生生的活着、存在着。写商场的文学作品很多，但大多是写商场上那些叱咤风云的大人物的，我却更关注于那些商场上弱势的小人物，这不仅是因为我曾经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物”，而且我的经历告诉我，在商场上成功的大人物永远是少数，而真正构成了商海中纷繁芜杂的却是那些被忽略了的小人物。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崇尚英雄的社会，成功者们享受了太多太多的鲜花和赞誉，而对那些弱小的人们，社会和公众的目光至多是一扫而过，他们的生活、情感往往被忽略了，而殊不知这些才是真正的社会意义上的“人”，对他们我不能、也绝不会视而不见。“才子佳人”式的生活和情感固然浪漫，固然可以让少男少女们想入非非，但生活永远不会是那样轻松和单纯，当一个人置身社会的时候，他就已经自觉和不自觉地背负起了生活和精神的重负，我没有理由让生活在我笔下失真地浪漫。

《中关村倒爷》中的许多情节可以说是我事业初创时的真实写照，当年我就是如同书中的“他”那样在北京风雪交加的冬天伫立街头，追逐着每一个可能成为自己的客户的行人，推销“赊”来的电脑主板，也真的因为雇用了第一次跑长途的司机，而南辕北辙，把要送到济南的货拉到了锦州。当然，文学作品毕竟是再创作，这部书也不是我的自传，有些情节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而有些自然难免是为了故事的需要而虚构出来的。但不管怎么说，我觉



得自己是比较真实地再现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上那些在商海中奋斗，亦或说是挣扎的“小人物”的生活和情感。

《中关村倒爷》创作完成后，我着实兴奋了一阵子，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不仅是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更重要的是我终于把自己创业中的经历和感受做了一个还算满意的总结，人活着不能仅仅为了温饱或者是更多的物质生活，人之所以成其为人，原本就是因为他具有思想，让我庆幸的是自己的思想终于没有被商海中的尘埃掩盖。

《中关村倒爷》初名为《老街》，现在的书名是花城出版社的编辑詹秀敏老师改定的，这是我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作为一个无名作者，如果没有詹老师的大力提携和帮助，要使自己的作品出版是不可能的。说到这本书的出版还有个小故事，在稿子寄出后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音信，直到二〇〇一年九月七日那天上午，我接到詹老师的助手打来的电话，才知道稿子已经通过了花城出版社的选题，准备出版了，而那天恰恰是我三十八周岁的生日，我放下电话激动地对妻子说，这是我有生以来收到的最重的一份“生日礼物”！

《中关村倒爷》完成后，我有两年多的时间没有写小说，“寓公”的生活闲暇自在，“退休”后我添了不少爱好，比如种花、养鱼，最主要的是研究茶艺和紫砂茗壶，我几乎跑遍了中国主要的茶叶产区，更是跑到宜兴的紫砂工厂去拜师学艺，收集了几百把紫砂壶，研习古今茶艺，沉醉在芳茗之中，忘情于紫砂艺术，写下了《紫砂茗壶考》和《中国茶艺》两部专著，又在澳大利亚的《星岛日

报》和《东华时报》上开辟了专栏，写一些有关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文章，慰藉那些远离故土的海外游子的心灵。

闲云野鹤式的生活让我回过头去再看曾经羁绊在商海中那份紧张、芜杂的生活，发现虽然商海给了我富足的生活和充实的人生经历，却也让我在其中失去了很多很多，商海中没有安闲和适宜，那里有的只是紧张的工作和残酷的竞争，而生活其实是多层面、多色彩的，如果一个人浑身上下除去铜臭气之外就没有别的了，那是多么的可悲呀。于是我想到要写一部关于“退休商人”的小说，在这部书里我要表现人对于自然、闲适的生活的一种渴望和追求。实际上每个人都渴望一种轻松悠闲的生活，不过是生活和社会环境限制了这种渴望，让人们不得不继续奋斗在各自的领域中罢了。但生活不能只以简单到事业的成功为标准，人活着还要有一些自己的爱好，要有精神上的满足和享乐，人毕竟不是、也不能成为工作的机器。

在上海生活了几年，这里已经成为了我的第二故乡，我已经融入了这座繁华的城市和这里的生活，所以我决定把这本书的背景选择在上海。至于书中的主人公，我还是把他写成一个北京人，除去对自己出生和成长的乡土的热爱，大约是我更熟悉北京人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吧。如果说《中关村倒爷》中的主人公身上更多的是我自己的生活中的影子的话，那么《上海闲人》中的郁有则更多的是我脱离商场后精神上的写照。从我一九九一年初夏离开海口回到北京创业，我在北京的商场上摸爬滚打将近七年的时间，在这七年里我几乎就是一架不知疲倦的赚钱机器。创业伊始，缺乏资金，没有门路，完全凭着一腔激情，是一

种实现自我价值的信念在支持着我，在经过了不胜枚举的艰难之后，我成了商场上小有成就的成功者，金钱的充裕却并没有给我带来精神上的富足，每当夜半更深时，我总会怀疑自己的选择，总觉得自己血液中诗人的气质是那么的浓厚，浓厚得让我永远把自己看作一个商场上匆匆的过客，我知道商场只是自己暂时的栖息之地，却永远不是我最终的归宿。当我终于把自己从商场的繁杂中解放出来的时候，我发现生活原来是如此多姿多彩，人活着，还有那样许多的乐趣。钱固然是个好东西，而且永远不会嫌多，但如果人的生活中除去了对金钱的追求之外就一无所有了，那也绝对是一种悲哀，一种失落，人还是要活得充实一点，轻松一些的。于是，在《上海闲人》中我塑造了一个逃避商海重压，回归自然生活的人物。痴迷于茶艺和紫砂艺术之后，我结识了很多这方面的朋友，喝茶和玩壶的在现今社会中多是些有钱又有闲的人，台湾茶艺界有句话说是“爱喝茶的男人不会是坏男人”。我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至少如果一个人把他的钱和时间、精力用在茶艺上，他会被那清幽的意境所陶冶，这样的爱好虽然算不得多么积极，但至少比那些把金钱和精力都扔在美女和美酒上的男人要高尚和高雅得多吧。有闲的人也是形形色色，喝茶的人也绝不都是雅士，我的《上海闲人》中的茶客们因而也是各不相同，同样是喝茶、玩壶，但不同的社会经历和社会背景还是让他们显露出不尽相同的行为和心态。随着社会的进步，随着经济的发展，在我们的社会中已经出现了一个有钱而又有闲的阶层，这个阶层的人们有着特殊的生活习惯和心理状态，在北京，这些人被称做“息

爷”；在上海，叫作“白相人”，他们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他们的经历和心态代表着从奋斗，到成功，到回归自然的一个完整的生活和心路历程。但他们毕竟不同于俄国文学中“多余的人”的形象，他们是思辩者，他们仍然置身于现实社会之中，他们的生活和心灵间依旧充满着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他们不同于一般人的地方在于他们可以把自已放到一个更冷静、更客观的角度上去观察、欣赏生活中的一切，在他们厌倦的时候，他们可以最大限度地远离世俗，而在他们愿意的时候，他们依旧是热衷于生活的一群，他们今天的闲适只不过是為了缓解暂时的身心疲惫，就像一部赛道上忽然驶入加油站的赛车，享受一刻难得的安闲罢了。

我这个“闲人”却没有郁有那样的福分，因为我实在是无法让自己思维有半刻的安闲。自从一九九一年离开海南岛，那座我曾经生活了将近两年的海岛，那片我洒下过热血的土地就成了我魂牵梦萦的所在。去年秋天，一个当年一同在海南闯荡的朋友从北京打来电话，邀约我一道去海南钓鱼。踏上阔别了十年的海角天涯，置身在蔚蓝的大海之上，看着手中鱼杆上飘入海中的那根纤细绵长的鱼线，心一下子也飘摇到十年前那段让我刻骨铭心的生活中去了。

当我第一次踏上海南的土地时，这里刚刚成为我国的第三十一个省份不久，大特区的开发正是如火如荼。那年我还不到二十七岁，还充满着“只要给我一个支点，就可以撬起整个地球”的豪情，然而现实的残酷和理想的瑰丽之间的距离却是如此巨大，当我看到流落街头，靠给人擦



皮鞋为生的大学毕业生眼中茫然若失的神态时，我的心在颤抖；当我在海口的街头生平第一次遭遇妓女的骚扰时，我几乎要痛哭失声了。幻梦中一切的美好：事业有成，男欢女爱，竟然在这里都变得如此扭曲，经济的阵痛期中，人性是如此的脆弱，理想的破灭是那样的轻易。事业的发展也远不如我想象的顺利，原本抱着来大特区轰轰烈烈大干一场，成就一番丰功伟绩的念头，却看到了太多烦躁、浮夸的东西，很少有人去踏踏实实地做点事情，商场上充斥着投机和欺骗，我迷茫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几乎要自暴自弃了。那时，我天天出入于赌场和歌厅，只要赢了钱就去泡妞，可以说过着一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极其消沉的生活。一九九〇年一个漆黑的冬夜，我在海口泰华酒店门前的大排档上遭遇了一次莫名其妙的袭击，当时十七八个海南“烂仔”在我毫无防备的时候，疯狂地砍杀过来，在手术台上，我流了半塑料桶的血，头上、腿上缝了整整八十四针，输了800CC血，才捡回一条命来。事后经过警方的调查，才知道那是一伙受雇于人的杀手，而他们袭击我仅仅是因为他们认错了袭击的目标。当时负责这个案子的警官是从东北调到海口的，和我这个北京人算是半个老乡，他透露说那些“烂仔”是受雇于一个开设赌博游戏机房的老板，袭击的目标是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北京小伙子，因为那个小伙子让赌场老板吃了不小的亏。我就这样代人受过地几乎命丧海角天涯。

故地重游，我惊异于海南如今的辉煌了，大特区早已不再是昔日荒蛮落后的海岛了，这里的繁华超过了内地许多大都会，可我眼前却总浮现着当年那一幕幕苦斗和挣

扎，那一桩桩含泪流血的伤痛，正是第一批大特区“淘金者”的血泪才造就了今日这座岛屿的美丽和富饶。创作的欲望让我再也无心留连于迷人的山水，醉人的美食了，我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把当年为海南的开发和建设付出了血泪的第一批“大特区人”的故事讲述给那些醉心于海南的美丽和繁华的人们，让他们知道这里的昨天。

回到上海后，我立即投入了长篇小说《海南过客》的创作中，只用了短短一个半月就写出了初稿。在这部小说里，我向读者讲述了一个在大特区成立之初，只身闯荡海南的北京青年王亦凡在海南创业的故事。就如同当年美国西部开发一样，海南的开发和建设的初期，拥入这座岛屿的开拓者们或多或少地都显露着他们的盲目性、投机性和冒险性。那是一个充满着成功的机遇，也充满着失败的风险的年代，成功者固然不少，但更多的却是最终碌碌无为甚至失败的人们。生活原本就是这样，金字塔的顶端毕竟是狭小的，而构成塔身的基石永远是那样广阔，那些没有成功的人们，他们同样为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付出了很多，在我心目中他们同样是不可磨灭的英雄。从祖国四面八方汇集到大特区的青年人们也都满怀着对爱情的憧憬和渴望，在恋爱的季节，他们也像所有这个年龄的年轻人一样敞开心扉，大胆地去爱，演绎着青春的激情，但大特区的恋爱就像创业一样的艰辛，对于那些事业未成，前途未卜的青年男女来说，生活绝不仅仅是卿卿我我的甜蜜，在急风暴雨中，爱的小舟是那样容易倾覆，人毕竟不能依靠爱情活着，当世俗的压迫危及到生存和前途的时候，被牺牲的往往是爱情，就像王亦凡和张大换、陈晨之间的情感纠